



XU HE FANG BITAN

徐福龄 著

续河防笔谈

黄河水利出版社

黄河水利委员会治黄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图书

续河防笔谈

徐福龄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续河防笔谈/徐福龄著. — 郑州: 黄河水利出版社,
2003. 5

ISBN 7-80621-635-9

I. 续… II. 徐… III. 黄河-防洪-文集
IV. TV882.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95342 号

出版社: 黄河水利出版社

地址: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路 11 号 邮政编码: 450003

发行单位: 黄河水利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及传真: 0371-6022620

E-mail: yrcp@public.zz.ha.cn

承印单位: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11.25 插页: 5

字数: 192 千字 印数: 1—1 000

版次: 2003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621-635-9/TV·296 定价: 30.00 元



2002年5月16日，九三学社黄委
基层委员会在郑州举行徐福龄同志90
华诞座谈会，图为徐福龄向前来祝贺的
人们致谢。



2002年11月20日，黄委会黄河志编委会第四次扩大会议在郑州召开。图为与会代表合影。前排中为黄委会主任李国英，左五为河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许还平，右五为黄委会主任助理郭国顺，左二为黄委会宣传出版中心主任骆向新，右四为本书作者徐福龄。



1997年10月28日，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胜利截流。图为徐福龄(左)与原黄委会主任龚时飏(中)、黄委会总工程师吴致尧在截流仪式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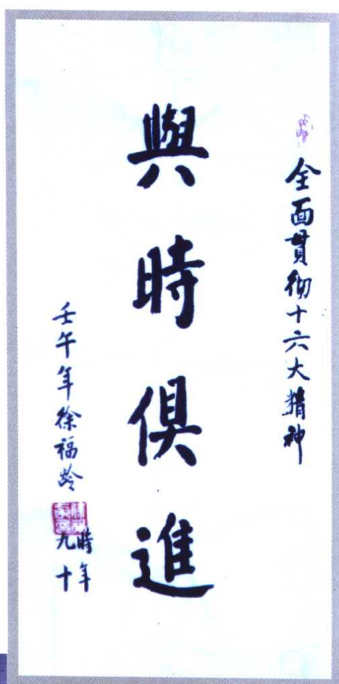


2002年5月17日，是徐福龄(右二)90岁生日，黄委会副主任苏茂林(右三)、主任助理兼办公室主任郭国顺(右一)、离退休局局长孙山诚(右四)前来向徐福龄表示祝贺，并与之合影留念。



1998年5月17日，作者85岁寿辰时与全家合影。

为庆祝中共十六大
胜利召开，作者挥笔书写
“与时俱进”条幅。



徐福龄在认真学习中共十六大精神。

愈久弥坚大河情

——《续河防笔谈》序

阅过《续河防笔谈》书稿，我深为一位九旬高龄老人执著的赤诚情怀所感动。这是徐福龄先生继 80 岁撰著《河防笔谈》之后的又一部治河专著，字里行间，倾注了对黄河治理开发事业的执著追求与思考，凝聚着一腔愈久弥坚的大河之情。

徐老先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治河专家，从 1935 年投身治理黄河工作，迄今已 68 年。在长期的治河生涯中，他注重现场调查研究，躬行实践，亲自参加或组织过许多黄河重大抢险堵口工程，对下游河道演变、堤防形态、修守状况、河工技术等，都熟稔于胸。同时，善于汲取前人的治河经验，结合实践运用验证，形成自己独到的见解。譬如，关于人们极为关注的黄河是否需要改道的问题，他通过对明、清黄河故道和现行河道的深入查勘和对比分析，鲜明地提出“黄河不需要人工改道，现行河道尚可维持 100 年”的结论，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针对下游河道游荡多变的严峻河势，他提出“通过护滩、治滩，固定中水河槽、稳定河势”，“增

强河道输沙能力，使大水、中水、小水时期，均能溜走河槽”，“应尽量分配适当的输沙水量，防止下游河道继续恶化”等治河意见与措施，实践证明都是行之有效的，在黄河治理与开发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徐老先生也是一位享有声誉的水利史志专家，在治河史研究方面有着很高的造诣。1983年，他于古稀之年受任黄河志总编室主任，开创了黄委修志编史的新工作。他亲自撰写和组织推动了《黄河志》志稿的编纂，参加审定的《黄河防洪志》曾荣获中共中央宣传部首届“五个一工程”优秀图书奖。

几十年来，无论是在紧张危险的防汛抢险工地，还是风餐露宿的河道查勘现场；无论是社会离乱的困难岁月，还是孜孜修志的桑榆晚年，他一直努力践行着自己“人生有限，事业无穷”的信念，为黄河治理开发事业不停地做着贡献。如今，年届九旬的徐老先生，不顾年迈，仍辛勤耕耘，将最近几年的治河思考总结、提炼，又出版了这部《续河防笔谈》，这种对治河事业的执著追求与甘于奉献的精神，值得我们敬仰与学习。徐老先生堪称一代黄河人的楷模。

是为序。

李国英

2003年3月

自序

我祖籍浙江吴兴县（今湖州市）。父亲徐家璘，清末留学日本，回国后教过一年书。1912~1926年，他先后在河南省南召、唐河、泌阳、商水、永城、商丘、许昌、中牟、项城等县当过知事或县长。1922年冯玉祥在河南执政时，嘉奖父亲为模范县长。他一生为官，两袖清风，家境并不富裕。1926年父亲得了一场重病，卧床数年，家境每况愈下，曾依典卖度日。1934年病愈后，在开封国学专修馆任教，1936年春的一天他在上课时，突然吐血不止，于当年逝世。

1913年5月17日我出生在河南省南阳县，幼年时代，随父亲的工作调动，举家迁徙不定。6岁开始由母亲教我认字，以后请先生在家就读。1922年直奉战争爆发，中原混乱不安，除父亲一人留在河南，全家暂迁往山东省济南姨母家避难。我在济南模范小学读了四年书，1926年回到河南开封，接着又读了一年私塾后上

中学。1930年中学毕业，父亲叫我考高中，将来再考河南大学。我觉得家境困难，不可能再读8年书。适逢河南省立水利专科学校招生，3年毕业即可安排工作，于是未经父亲许可，便考入该校。入学一年后，学校又改为5年制（3年高职，2年专科）。高职毕业后，家里已无力供我继续求学，后来还是学校帮了我，让我分管发放讲义，并利用晚上为学校誊写讲义，这样每月可收入6元银洋，再加上大姐及二姐平时的资助，又上了两年专科，于1935年毕业，时年22岁。

二

“黄河”这两个字，我在济南上小学时，就有了印象。我13岁那年，一次上地理课，老师叫每人画一张山东省彩色地图。地理老师姓张，黄胡须，平时对学生要求很严格，大家都怕他。当他看完我画的地图后，板着面孔问我，画的地图有无错处？我说，没有。他又面有愠色地问道：究竟有无错处？我还说没有。他放下铅笔，顺手打了我一耳光，说：“你把黄河的尾巴画到莱州湾了！”我一看才明白过来，心里很惭愧。虽说挨了打，一时受了痛，但“黄河”二字却深深地留在我的脑子里。1926年我由山东回到河南时，父亲正在中牟县

当县长。他那时常说中牟县是个“沙陀国”，县城以北，黄沙累累，是黄河在中牟决口造成的。当时我很不理解，为什么黄河水会带来这么多的黄沙。我在水专读书期间，学了郑肇经编的《河工学》，书中每篇后都摘有一小段古代治河记载，很感兴趣，因而也常常到图书馆浏览一些古书，如《回澜纪要》、《安澜纪要》等，后来学校又增加了有关黄河的课程，逐渐对黄河有了粗浅的认识。1934年河南封丘贯台堵口合龙后，学校组织我们到贯台工地参观，调查堵口情形。我毕业时，在陶述曾老师指导下，写了《关于黄河的防洪与堵口》的毕业论文。毕业后分配在黄河水利委员会河南河务局，为实习生。那时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是李仪祉，河南河务局局长是宋渤，陶述曾为河务局技正。

我一走上工作岗位，就遇到1935年7月陕州13300立方米每秒的洪水。上级叫我每天将陕州水文站流量及下游来童寨、黑岗口、柳园口、东坝头各险工的水位，绘制成水位涨落曲线图，挂在机关影背墙上，以示警惕。当洪峰通过东坝头后不久，发现水位陡落，经电话联系，得知在山东鄄城董庄决了口。这场大水，在河南境内顺利通过，未出大险。那时治河，各自为政，没有全局观点，故在“霜清”之日，河南河务局为了庆祝安澜，举行了“安澜宴”，那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

宴会。

1936年春，我实习期满，被调到河南河务局沁河测量队任测量员（队长为郝西庚），成为一名正式职工。正当这时父亲去世了，从此一家10口人的生计，压在我一人肩上。

我在沁河测量的过程中，对两岸的险工作了一些调查。从了解的情况中，得知沁河有“小黄河”之称，大水时，溜势湍急，临堤险工多坐弯顶冲，常有决口之患，故我对沁河印象也很深刻。

1937年河南河务局改为修防处，我调回河南修防处任技术员、工程师。1938年日本侵略军占我华北大部以后，中原形势日趋紧张。日军为了打通津浦线，向徐州及黄河一带发起了攻击，河南省会开封吃紧。当年5月中旬黄委会西迁西安，河南修防处部分员工移住河南郟县，其余人员领了两个月的疏散费，各奔前程。我也在疏散之列，并已将家属送往临汝县城侄儿家，自己于6月3日乘开封到洛阳最后一趟军车离开开封，冒雨走了一天一夜才到洛阳。3天之后，得知在花园口扒口，黄河夺流南犯。当时我想，若在开封晚走两天，即被隔在“黄泛区”的东岸。由洛阳到达临汝，住了一个多月，坐吃山空。后来听说河南修防处又移住洛阳，即回洛阳找到修防处主任陈汝珍，请求复职，经允准留在

工务科工作。不久临汝遭到敌机轰炸，一颗炸弹落在我家住的前院，家具被炸，幸家人事先逃避，未受伤亡，亦不幸中之大幸也。

1938年冬，因日军继续西犯，河南修防处又奉令移往西安。到达西安以后，每日数次警报，天天躲避飞机轰炸，难以安心。

花园口决口当年7月，河南省政府和黄委会联合成立修筑防泛西堤工赈委员会，拟沿泛区西岸，修筑一道防泛西堤，以防溃水西犯。后因大汛将至，只修了郑州花园口以下经中牟、开封至尉氏县境一段新堤，长34公里。1939年2月，河南省政府与黄委会又组成绩修防泛新堤工赈委员会，会址在河南许昌，领导接修防泛新堤的工作。当时黄委会派河南修防处技正左起彭和我及林华甫三人回河南，参加自尉氏以下到豫皖交界防泛西堤的勘测和修筑。经过测量定线，拟定了尉氏以下经扶沟、西华、淮阳、商水、项城、沈丘至界首的堤线，长282公里，加上1938年所修的尉氏以上新堤34公里，共长316公里。堤成之后，交由河南修防处接管防守。当时黄泛区东岸为日军占领区，所以国民党军政当局明确已修的防泛西堤，既是河防，也是国防。就在这年，河南修防处由西安迁回洛阳，又从洛阳迁至郑州。同年，我被提升为河南修防处副工程师。

1939年秋末，国民政府军在沁河北岸老龙湾扒口，拟淹驻在武陟木栾店的日军。日军发觉后，随即在木栾店以上沁河南堤五车口扒口，淹了沁南大片地区。当地群众为了减少淹没损失，在黄河北堤涧沟及沁河南堤方陵扒开两口，使泛水排入黄河。武陟县政府迫切要求河南修防处迅速派员，调查口门情况，拟具堵复计划，进行堵筑。我本来定于10月结婚，但修防处主任苗振武亲自找我谈话，希望我推迟婚期，马上赴武陟工作。我当即带工人丁兆成（武陟县人）作向导，化装前往。在地方武装的保护下，对各口门进行详细丈量，提出了堵复计划，由地方组织施工，堵合了五车口、方陵及涧沟等口门。然而自此以后，国民政府军和日本侵略军仍不断在沁河南北两岸扒口，直至抗战结束。

三

1940年黄委会河防处处长王恢先调任河南修防处主任。他到任后，确定沿河修防段均改为有一定学历的技术人员任段长。那时防泛新堤共划分三个修防段，是年春，调我为防泛新堤第三段段长，负责周口至豫皖交界的堤段，包括商水、淮阳、项城、沈丘四县，主要防沙河南堤。因为黄河夺贾鲁河入沙河，同时沙河北岸又

有 11 条串沟引黄入沙，故沙河南堤成为黄河的堤防。后来北岸的 11 条串沟堵筑了 8 条，并修筑沙河北岸周口北寨至淮阳济桥 40 公里的堤防，亦交由第三段负责修守。实际上第三段负责修守的是沙河南北两岸的堤防，共计 140 公里。由于战事日趋恶化，黄委会和河南修防处又往西迁，各修防段不能与之直接联系。黄河堤防的防守事宜，由沿河驻防的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及鲁苏豫皖边区司令部部署，具体负责的是第十五集团军何柱国总司令。1942 年正值河南大旱，修防员工生活十分困难，在驻军及地方的协助下度过了灾荒。

沙河两岸的堤防，遇到沙河与黄河并涨时，南堤最为吃紧，而北堤则是腹背受到威胁，每到汛期，军事当局指定周口以上到邓城 20 公里的沙河南堤也由新堤第三段负责防守。由于防线过长，河工料物短缺，数年之间，上下河段巡堤抢险，遇到了不少困难。

1942 年汛期接到水情电报，说是陕州 8 月上旬要发生 25000 立方米每秒的大洪水，正好河南省政府委员宋垣忠到周口视察黄河，马上召集会议，布置防守。当时周口南寨沙河南堤上有不少民房，根据水情估计，这场洪水到来，洪峰由贾鲁河流入沙河，首先顶冲南寨堤防，并有漫堤可能。为了赶修子埝，防止漫溢决口，宋垣忠决定即速拆除南堤民房，并限两日拆完。民房拆完

后，很快在南堤顶上修起了一条子埝，还动员全寨居民，沿堤防守，严阵以待。及至洪峰到达后，并不像预报所说，后来才知道是预报错了，实际陕州8月4日洪峰流量为17000立方米每秒，多报了8000立方米每秒，致使人力、物力遭受一定的损失。这件事说明洪水预报正确与否，对下游防守具有重大影响，万万不可大意。

1942年12月，鲁苏豫皖边区党政分会主任汤恩伯，在安徽临泉召开会议，通知黄委会派员参加，主要研究防范泛水越沙河南堤继续南泛的问题。我被指派就近参加此会。会议由何柱国主持，决定对黄泛区进行全面查勘。会后我参加了鲁苏豫皖边区组织的黄泛视察团（团长为高参钟定军），上自河南尉氏下至安徽颍上，我负责编制河南泛区培堤计划，计需土方600万立方米。1943年5月下旬，汤恩伯在周口召开黄河修堤会议，黄委会张含英委员长参加，依据查勘制定的工程计划，部署了复堤任务，要求当年全部完成。

1944年汛期涨水，风雨交加，沙河北堤受到严重冲刷。我骑车冒雨赴工查看，有1公里多长的大堤堤身已被冲塌1/2，岌岌可危，但只有工程队分队长冯俊卿和工程队员及少数民工抢险，人少料缺，眼看着洪水把大堤冲开，口门宽约300米，地点在淮阳县宋双阁。该处原有一道黄河入沙的串沟，叫宋双阁沟，1940年修